

李中垣 著



八十述往

天津人民出版社

BA SHI SHU WANG

LI ZHONG YUAN ZHU

责任编辑：刘文君
美术设计：赵中令

ISBN 7-201-03088-4 / K·396
定价：28.00元

八十述往

李中垣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八十述往
李中垣 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市双马印务有限公司承制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220 千字 插页 0.625 印张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200

ISBN 7—201—03088—4

K·396 定价:28 元

序 言

聂壁初

李中垣同志的回忆录——《八十述往》出版了,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李中垣同志是长期在天津工作的一位老同志。他在 30 年代投身革命。那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并向华北和全中国伸展它的侵略势力。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外采取不抵抗主义,对内残酷镇压革命活动,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1936 年,正在河南开封师范读书的中垣同志,只身从河南到北平,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寻找党的领导。他积极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在斗争中找到了党组织,开始了为党的事业奋斗的历程。不久,中垣同志奉党的指示到山西工作,在薄一波同志领导

下,先后担任“牺盟会”特派员和翼城县县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为创建抗日民主政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做了大量工作。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中垣同志担任浑源县县长,在异常残酷的环境中,坚持敌后游击战,为晋察冀边区的巩固与发展做出了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奉命到天津地区工作,担任静海县县长等职。天津解放后,中垣同志参加了城市接管工作,并很快转入工业部门,相继担任天津地方工业局副局长、全国重点项目 115 厂厂长、天津第一机械工业局局长、天津计划委员会主任,曾两度出任天津市副市长。十年浩劫期间,中垣同志遭受残酷迫害,被监禁审查长达 6 年之久。1973 年重新恢复工作后,他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主持天津港口的扩建工作。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带领数万筑港队伍奋战三年,胜利完成了党中央和国务院交给的任务。中垣同志是天津解放后最早转入工业战线的老干部之一,长期担任主管工业的副市长,并先后兼任过计委、建委、经委主任等重要职务,为天津工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卓著成绩。

中垣同志献身革命事业 60 多年，始终矢志不移，坚持斗争。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心。离休后，他仍以一个老党员的崇高职责要求自己，力争为党和人民多出一份力，多发一分光。特别是对天津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协作、食品工业、老龄工作、革命传统教育、党风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极为关心，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中垣同志对天津市工业方面的情况非常熟悉，对大多数工厂的位置、人员干部组成、机械设备、产品产量等，了如指掌，如数家珍，素有“活地图”、“活字典”之称。1961 年，我们一起参加了在庐山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会上，周恩来总理曾问及天津工业的情况，中垣同志对答如流，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同他平时勤奋好学、刻苦钻研是分不开的。会议期间，陈伯达曾散发材料，批评天津在工业调整方面的做法。中垣同志认为陈对天津的指责与事实不符，及时向市委作了汇报，并整理了有关材料予以纠正。后来，这份材料是由我向有关方面转呈的。中垣同志还利用参加会议的机会，向中央反映天津的情况和存在的实际困难，争取

中央对天津的支持，这在当时确实是十分不容易的。

中垣同志的回忆录不仅记述了他个人的革命经历，而且反映了那个时代相当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我们可以看到，在那苦难深重的漫漫长夜，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是怎样在党的指引和领导下探索前进的。他们走出学校，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和武装斗争，经受血与火的考验，从单纯的爱国者锻炼成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这本回忆录还记述了解放以来天津市工业发展的一些重要情况，以及“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些重大活动，对于研究解放后天津的历史，特别是工业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垣同志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我相信，广大读者将会从这本书中得到教益和启迪。特为序。

目 录

开头的話	(1)
一、我的家庭	(3)
二、求学坎坷	(8)
三、北平入党	(19)
四、太原受訓	(29)
五、翼城抗战	(41)
六、雁北烽火	(71)
七、奔赴天津	(87)
八、转入工业	(105)
九、计委八年	(149)
十、“文革”浩劫	(209)
十一、“军事监护”	(259)
十二、三年建港	(299)

十三、重返工业	(322)
十四、经济协作	(360)
十五、老龄工作	(387)
结束语	(409)

开头的話

我今年已经 80 岁了。过去，我一直没考虑过写回忆录，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几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虽然做过一些工作，但由于自己水平不高，能力有限，工作中也没有什么重大建树，确实没有什么值得介绍的。因此，多年来我虽然写过一些回忆其他同志的文章，但始终没有给自己写回忆录的打算。1986 年，我 70 岁时，老战友安岗同志曾建议我写写自己这 70 年的人生经历。他说，70 多岁了，趁健在之际，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也好在政治上向人民做个交代。近几年来，我又陆续看了不少同志写的回忆录，从中加深了对一些历史事件的理解，学习到很多知识。我逐渐认识到，写回忆录尽管是写个人的经历，但又并非完全是个人的事情，因为它可以从某个侧面、某个角度反映历史。以我本人为例，从 1936 年参加革命到现在，整整 60 年了。其间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建设新中国、“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重要的历史时期，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有不少经验教训值得总结。我愿把自己几十年经历的事情写出来，一方面希望能有助于现在的青年了解今天的一切是何等的来之不易，使他们更加热爱并珍惜今天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希望他们能从我们的失误中总结经验，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就到天津地区工作，从此之后，我在天津工作、生活了半个世纪，与天津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的回忆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同天津有关的，如果这些回忆能为有关单位和专家、学者在研究解放后天津的历史方面提供一些史料和参鉴，我将感到十分欣慰。

由于是个人回忆，加之经历年代较久，难免有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李中垣

1996年4月

一、我的家庭

1916 年农历三月二十日，我出生在河南省扶沟县的曹岗村。这是一个有 300 多户人家的村子，土地主要集中在周、李、黄、王十几户地主手中，特别是村西头几家姓周的地主，家里存有很多粮食，靠放高利贷盘剥农民。广大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从我记事起，家乡便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地方。村子离县城较远，在封建军阀统治之下，地方劣绅更是为所欲为，种鸦片、抽大烟、赌博之风很盛。由于地少人多、生活贫困，村里年轻人出外当兵的很多，视做一种谋生手段，其中大部分人在冯玉祥的部队里，我叔伯弟兄 10 人中就曾有 5 人在冯玉祥部队当兵，这大概同吉鸿昌家离我们村不远有关。

吉鸿昌将军是河南扶沟县吕潭镇人，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吕潭镇距我们村约 30 里，

是周围一带最大的镇子。1913 年冯玉祥在河南招募了 1600 多名新兵,大多是年轻力壮的农家子弟,吉鸿昌便是其中之一。由于他作战勇敢,逐渐成为冯玉祥西北军中的名将,先后担任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军长、宁夏省政府主席等职,在我们家乡一带很有影响。此外,同其他军阀部队相比,冯部的军纪相对要好些,因此当时不少人把参加西北军作为一种出路。吉鸿昌于 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平津一带从事抗日斗争活动。1934 年 11 月,在天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不久在北平遇害。吉夫人胡红霞及子女长期生活在天津,解放后我们一直保持来往。

我家原本是书香世家,祖父李玉楼是前清秀才,到了我父亲这一代时家境逐渐没落,成为自耕农。解放后土改时,我家定为中农。父亲兄弟两人,在我记事前已经分家。父亲李应试是个穷秀才,在村里教私塾,附近村庄的亲友办红白喜事常请他“站礼”(类似司仪)。叔父李应举是中农,会兽医。我记事时,家里有 20 多亩地,由于人口多,还租种了地主的一部分土地,青黄不接或遇到灾年时常

需借粮。后来靠在冯玉祥部当兵的大哥往家寄钱，开了座小油坊，生活才基本稳定。父亲非常迷信，相信风水，做了不吉祥的梦就在墙上用毛笔写“夜梦不祥，照在西墙，太阳一照，化为吉昌”。母亲职氏是家庭妇女，先后生过 8 个孩子，养活了 7 个。我是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上面还有一个姐姐，5 个哥哥。大哥李永龄，在冯玉祥部队当军需官，后到吉鸿昌部任职，1932 年去世。二哥李永昌、三哥李延龄、四哥李元凯、五哥李梦龄，起先都在家里务农，随着家境日趋破落，四哥李元凯也到冯玉祥部队当兵，以后又到杨虎城部队任连长，1946 年去世。五哥李梦龄，1938 年初在山西参加革命工作，解放后，在福建建筑公司担任经理，1961 年病故。我原名李丙辰，母亲生我的时候已近 40，由于是自己接生，从此落下了病，在我 6 岁时就去世了。

因为家里孩子多，母亲又有病，我出生后又哭又闹，父亲很厌烦，就把我放到村里的井台旁，并生气地说，干脆让狗吃了吧。后来，住在井台附近的贫农尹恒科，将我抱回他家抚养了一段时间。此后，我就认尹恒科夫妇做干爹干娘，日常称他夫妇

为爹娘，每年过节都去他家磕头。

母亲去世后，家里只剩下父亲和我，只好经常到亲戚家“凑饭”。父亲外出时，我常住在四叔李应忠（父亲的叔伯兄弟）家里。我几乎走遍了所有的亲戚家，包括出了门的姑姑、姐姐家，甚至连嫂子的娘家都去过。父亲一度想续弦，曾打算把我送到底阁大庙当小和尚，后因哥嫂反对才作罢。其实父亲还是喜欢我的，经常给我讲《论语》、《孟子》和古文，有时拉开嗓子念古文，似乎也是藉此来解闷。

1938年6月9日，蒋介石为阻止日军，命令国民党军队在河南郑州北面的花园口，决开黄河南岸大堤，结果黄河改道横流，流到我们那里宽达100多里，整个村子都被淹了。洪水过后，村里人回去挖了两丈深才找到原来的吃水井。家乡成为黄泛区，村里的人流离失所，只好外出逃荒要饭，不少人被迫卖儿卖女，全村人口死了一半以上。我的一个嫂子饿死在讨饭的路上，一个叫变变的侄女被拐卖到陕西乾县，现在还活着，已经70多岁了。我父亲也生活不下去了，带着三嫂及四个未成年的孩子，一路讨饭到了山西。

旧社会中国妇女的地位特别低，这一点从小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生个小孩先问是男是女，是男的全家高兴，给产妇买红糖；生女的家里人就撅嘴不高兴，并且说女孩是赔钱货。村里男人打老婆是常事，有的让老婆跪下，用绳抽打，娘家的人也不敢出来说话。

童养媳的命运更悲惨。在我家乡，年纪很小时父母就给说媒定亲。女方家里困难，就把十几岁的小姑娘送到婆婆家当童养媳。邻居李玉阳家招了一个童养媳，整天提水、烧火、打柴，每天睡在灶堂前的柴草堆里。同村杜绍唐的弟弟，结婚不久就病死了，弟媳年轻地守寡，后受人欺负服毒自杀了。像这类的事情，在当时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万恶的旧社会不知残害了多少妇女。后来我在开封师范读书时，曾以此为背景发表过一篇《童养媳》的短篇小说。